
香港人本土身份和國族身份的角力： 1996-2006香港身份調查¹

馬傑偉、馮應謙

摘要

根據1996至2006年期間進行的六次調查，我們首先勾劃出香港人不斷轉變的國族身份，探究港人認為構成「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元素，從而更瞭解建構「自我」及「他者」的複雜性。在經濟價值方面，香港人和大陸人的分別已慢慢消失，但在政治價值方面仍有明顯不同。本文一方面從調查所得的結果分析文化轉變，另一方面在收集數據的過程中，重新考慮我們在早期所預設的本土/國族對立框架。這種前後對比、反思，期望可對十年調查結果有更仔細及多層次的動態分析。

關鍵詞：國族身份、文化身份、跨境聯繫、身份標記

馬傑偉，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傳播學部主任、副教授。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著有*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合著)、*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香港記憶》及《地下狂野分子》等書。論文見於*Cultural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Social Text*、*Positions*、*Visual Anthropology*、*Gazette*、*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等學刊。電郵：ericma@cuhk.edu.hk

馮應謙博士畢業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流行文化與文化研究、傳媒政治經濟、青年和性別身份研究和新媒體研究。最近的研究專案是國際傳媒在中國的發展。合著新書有*New Television Glob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Imaginations*。中文著作包括《香港流行音樂文化——文化研究讀本》、《音樂敏感地帶》、《文化感覺》和《特區·政策·論理》。電郵：anthonyfung@cuhk.edu.hk

Lo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Surveys on Hong Kong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1996–2006

MA Kit Wai, Eric
FUNG Ying Him, Anthony

Abstract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more Hong Kong people claim a mixed identity, seeing themselves as both Hongkongers and Chinese. Their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mainland differences are disappearing in terms of economic values but are still conspicuous in terms of political values. They identify more with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remains weak. The authors try to problematize the once dominant mediated local-national dichotomy and propose a multi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s of Hong Kong's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transborder connections, identity icons

本文旨在研究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的數年間，香港人對中華民族不斷改變的觀感；同時，我們也批判性地檢視以往用來研究本土、國族身份的框架和方法。根據1996至2006年期間進行的六次調查，我們首先勾劃出香港人不斷轉變的國族身份，探究港人認為構成「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元素，從而更瞭解建構「自我」及「他者」的複雜性。我們又分析港人對一些突出中國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標誌的感覺，這些標誌包括萬里長城、解放軍、人民大會堂等。另外，從近期取得的數據顯示，我們得重新瞭解有關香港文化身份那「本土——中心」二元對立的分析概念，因香港現在已融入中國，一些普遍研究本地身份的框架需要重新檢視。概括而言，本文一方面從調查所得的結果分析文化轉變，另一方面在收集數據的過程中，重新考慮我們在早期所預設的文化想像。這種前後對比、反思，期望可對十年調查結果有更仔細及動態的分析。

「香港人」身份的普及大概可追溯至1970年代(參考冼玉儀，1995；吳俊雄、張志偉，2002)。對一般香港人而言，在1970至1980年代，可沒有感到應該要對國家履行甚麼責任。回首戰後殖民地統治時代，國內的政治動亂和運動都被拒於香港的門外。雖然香港亦有出現動亂的情況，但並沒有持續性地進展為普及的政治運動；而且，殖民地政府不鼓勵各種各樣的政治參與。直至1970年代後期，中國民族主義已非大部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文化參照，只有少部分是親共產黨或親台灣的活躍分子。香港與中國聯繫薄弱，發展了本土的文化身份，這是與香港本身的地域和生活模式有關，其中包含中國傳統價值，再加上英國在此之上加諸的儀式和規範。明顯地，這種香港身份沒有強烈的民族元素，也沒有與主權國家——當然不是英國，又不是中國——相連的政治聯繫。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從大陸來港的移民或其後代，又有些是因為大陸的政治混亂而逃亡來港。港人與中國有深厚的血緣關係。但是，自1970年代始，很多香港人在心理上感到與中國人的疏離。大眾媒體在此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愛把香港建構成一個現代化城市，而中國則為一個落後的國家(Ma, 1999)。這種對香港人和大陸人認知上的差距，變成本土文化身份的重要指標：香港人的自我形象跟中國人的形象愈不同，香港人的那種屬於自己本土文化的感覺便愈濃。即是說，地方性的認同與去國族化的程度(Ma & Fung, 1999)有密切關係，一些本地的學

者刻劃了一幅香港/中國雙重身份的圖畫(如Wong, 1996; Lau, 2000)。從我們的調查顯示，近年，單一認同中國或認同香港的比率有局部下降的趨勢；反之，「香港人，又是中國人」，「中國人，又是香港人」這類雙重身份變得更為普遍。

表一：受訪者自我表示的文化身份1996-2006(以百分率表示)

	1996	1997	1998	1999	2002	2006
香港人	25.2	23.2	28.8	22.8	24.8	21.5
香港人，又是中國人	32.9	31.8	30.0	35.8	36.0	38.1
中國人，又是香港人	14.7	11.6	15.6	17.0	14.5	21.2
中國人	25.7	32.1	24.5	23.5	23.6	18.6
其他	1.5	1.3	1.1	0.9	1.1	0.5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N=回應的人數)	(769)	(302)	(527)	(533)	(500)	(1007)

1996至2006年六次調查中，受訪者的身份都有一個較為穩定的模式，20%至30%的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自稱為中國人的比例也相若。1997年的調查結果則有點例外，32%的受訪者自稱為中國人。無疑，這與香港於該年回歸中國以及高調的回歸慶典有關。不過，後來自稱有中國人身份的比例就稍微下降，於2006年時則有18.6%。

其實，這些年間另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人們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融合起來，或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或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這情況在2006年的調查中最為突出。在眾多的身份類別當中，最多人自稱為「香港人，但又是中國人」，於2006年時有38.1%；自稱為「中國人，但又是香港人」的則有21.2%。兩個類別共佔了所有受訪者的差不多60%，顯示港人自稱有雙重的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

研究文化身份的學者(如Calhoun, 1994; Hall & du Gay, 1996)討論「他者」的概念如何在身份政治中的「他我異同」劃分界線。在1996至2002年的調查裡(2006年有所修正)，我們透過勾劃出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身份距離，將「他者」的概念具體應用於問卷設計中。調查的第一部分，探討了香港人對香港和中國身份的理解，以五點量表(1=非常同意，2=同意，3=

中立，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來量度。調查中問及香港人認為某些價值有多大程度是屬於香港人的，或是屬於大陸人的，從當中的差異可得知香港人對中國人的形象和自己本身作為香港人的形象的認知距離。同一項價值，受訪者(他們都是「香港人」)被問及其分別屬於「香港人」與「大陸人」性格特徵之同意程度。例如受訪者被問及對「香港人愛國」與「內地人愛國」這兩項陳述的同意程度(1代表「非常同意」、2代表「同意」、3代表「中立」、4代表「不同意」、而5則代表「非常不同意」)，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香港人」對其香港與中國身份各自不同的認知位置，透過它們之間可能出現的差異，從而探究公眾對「中國人」與「香港人」形象之間的「認知距離」。這種方法是基於一個假設，就是大陸人是香港人最突出的「他者」。不過，近年我們發展這種二元分法愈不適用，因為香港與中國的身份疆界已愈見模糊，而香港已回歸中國又使情況更為複雜。所以，這部分的問卷，我們在2006年停用。以下我們先會討論1996到2002年的調查結果，分析香港人和大陸人在某些方面的認知距離是否有收窄的跡象，然後再重新檢視問卷調查的方法預設，並作出適切社會變化的批判和反思。

普遍而言，受訪者對其本土身份之評價傾向正面，甚至感到自豪，對問卷內各項對「香港人」的正面描述，受訪者均傾向同意。如前所述，低於3分代表對相關價值之正面肯定，高於3分則代表負面評價。在受訪者評價自己的各項價值方面，大部分的項目(除「香港人謙虛」與「香港人愛國」兩項外)均低於3分。一般來說，「香港人」認為自己「實際」、「容易適應環境」、「醒目」、「上進」、「崇尚自由」與「西化」，這些選項的評分一般介乎1.5至2分之間，顯示其非常正面之評價。相對而言，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評價則較傾向負面，相較於香港人自己而言，就「自律性」、「敢言」、「崇尚自由」及「西化」等程度而言，大陸人都比較遜色。直至2002年的調查，香港人仍然擁有相對清晰的本土身份。

雖說直至2002年，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身份界線仍可說是清晰，但在年度間的改變趨勢而言，由「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想像界線」構成的身份距離正在不斷縮小。內地與香港身份界線於1996年研究的呈現是異常清晰的；但根據2002年所得，香港人對某些價值的自我評價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假若將有關香港人自我評價的資料分為三個不同的向

度，我們將能找到一個具體的對「內地與香港想像」之重新配置。第一個「傳統價值類別」向度包括「道德」、「謙虛」、「自律」、「有同情心」、「具忍耐力」、「文明」及「友善」等價值；第二個向度指涉一個資本主義與商業社會所擁有的價值特質，包括「實際」、「易於適應環境」、「醒目」及「上進」等；第三個向度為「自由民主價值類別」，包括「敢言」、「西化」、「具獨立思考能力」、「崇尚自由」、「重視言論自由」、「重視私隱」、「開放」及「重視平等機會」等特性。

1996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就第一向度「傳統價值類別」包含的價值而言，香港人的自我評價與對大陸人評價之間雖然仍然存在差異，但並不明顯；第二個向度「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價值類別」的差異則十分清楚，顯示受訪者認為商業價值是香港人之性格主軸。我們可以看到，1997前香港本土身份的形成主要建基於現代資本主義，這種集體意識正是香港本土身份的重要依據；第三向度包含自由民主價值，而香港人則一般認為自己比大陸人「西化」與「敢言」。

2002年的研究所得明顯有異於之前所有年份。之前幾次調查均顯示「香港人」相信其與「大陸人」的差異主要源於資本主義價值；但2002年的研究則發現，就資本主義價值而言，內地與香港差異正逐步縮小(累積差異由1996年的-0.78降至2002年的-0.43)。具體而言，「香港人」開始發現「大陸人」與自己差不多同樣的「上進」，而且同樣的「易於適應環境」。有關轉變的出現可能是由於中國經濟市場的不斷開發，以及「內地與香港經濟融合」論述的不斷被強調。

有見於香港人對政治改革愈來愈關注，1999及2002年的調查加入數個有關的新項目，這個代表現代與民主價值的項目群突顯出內地與香港之差別，意味著在「一國兩制」這個特別的政治安排下，國族與本土身份之間複雜而且持續的角力。香港人被吸納進巨大的中華國族，但對於中國內地與香港社會之間的矛盾甚至對立而形成之區別，香港人則相當敏感。在不少香港人眼中，中國內地是一個實行威權主義的國家，而香港則是一個相對自由而且多元的社會。就結構而論，香港是一個自由而現代但欠缺民主政治系統的城市。但是，自1990年代開始，在香港的去殖民化與再中國化過程中，香港人對民主改革形成強烈需求。2002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基於資本主義價值形成的內地與香港差異雖然有減退的迹

象，但建基於現代與民主價值的內地與香港差異則相對顯著（累積差別仍然高企，由1996年的-1.2至2002年的-0.98），意味著雖然「經濟因素」（起碼在香港人的主觀認知中）不再成為有效的區分大陸與香港的指標，但香港人仍尋找另一套有效突顯內地與香港差異的準則。香港人持續的認為，對比大陸人，他們更敢於表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關注。

綜合而言，雖然自1990年代出現強大的再國族化趨向，但內地與香港之間仍然可以說存在一條清晰可見的「身份界線」。內地與香港差異雖然於「資本主義價值」向度方面有收窄的傾向，但在「現代民主價值」向度方面仍然明顯。量化調查研究建基於特定歷史情景的論述框架加諸於現實之上。今次這個調查設計，是建基於戰後內地與香港之間之巨大差異而形成的二分框架。在這個框架之內，香港人透過不斷將大陸人「他者化」，以圖強化自己的本土身份。身份距離這個概念能有效的實現香港人給自己身份定位的強烈動機，而它則建基於內地與香港對立的二元框架。這個框架於1990年代仍然運作良好，但到2000年代，香港人面對著與（比「想像」更複雜多元的）「大陸人」逐漸融合的政治現實，上述對內地與香港關係之詮釋框架似乎顯得有點與現實格格不入。量化調查其實也不能避過具體歷史時期的偏頗。它雖追求客觀數位，但思考框架仍然受制於時代思維。我們的研究助理於2002年進行電話訪問的時候，這個研究框架亦成為經常被受訪者質疑或批評的對象。時代轉變，過去的內地與香港對立思維也會修正。他們認為所謂的「大陸人」，其實是多種多樣，因此不能籠統提出如「你對『大陸人』的印象如何」的問題。當被問及對大陸人的印象，受訪者很多時候要求訪問員詳細及清楚界定「大陸人」的內涵，例如「你所說的『大陸人』是指知識分子、政府官員、農民？」這類問題的提出，意味著香港人的「國族想像」有漸趨多元化的傾向。

這一切都表示香港人的國族和本土身分複雜的角力。基本上，在經濟價值方面，香港人和大陸人的分別已慢慢消失，但在政治價值方面仍有明顯不同。下一部分將會談論香港人對身份標記的回應，用以量度香港人對香港和中國內地在文化、經濟、社會、軍事和政治上的觀感。這部分的調查設計沒有繼續沿用本土—國族的二分法，反而更著重本土和國族身份於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上的多角度變化。

身份、標記和情感認同

當香港回歸祖國已成既定事實之後，傳播媒介浮現大量代表中國的標記。一些混合國族與本土想像的「文化象徵」超出原來事件的既定脈絡，被引介到各種隨後發生之情景之中，並提供文化再創造的時機。香港人對這個冒升的中華民族身份是接受還是抗拒，可反映在他們對文化和民族標記的觀感上。

民族身份不單單是態度或認知上的認同過程，其中顯然是有情感上的連繫，使個人聯繫到群體。Scheff (1994) 指出，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討論，如Anderson (1983) 的「想像的共同體」，多是專注於認知上的，反而少有提及感覺和情感，而這些正正是民族和文化身份的重要元素。在我們的調查中，我們選取了在媒體，尤其是電視上經常出現的民族主權標記，訪問香港人對此等標記的情感反應。這些標記分類為文化、民族和軍事三方面，其中包括有萬里長城、解放軍、公安、國旗、國歌、人民大會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徽。在1996至2006年十年的調查裡，我們問及香港人對這些標記的感覺，或感自豪，或親切，或感抗拒。受訪者用一個五點量表來回答，0分表示沒有感覺，5分代表有強烈的感覺(結果見表二)。

萬里長城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意義，在眾多標記中最能表達出文化和歷史的意義。在十年的調查當中，香港人一直對此表示高度的尊崇和親切，73%至79%的受訪者指他們對此感到自豪，50%至59%對此有親切感。大家對萬里長城的認同感是超越其他標記的，這證明香港對國家文化和歷史方面有強烈的認同感(Wang, 1991)。

普通話是國家的共同語言，但大部分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說廣東話的。在1980和1990年代，香港人本土身份意識強烈，說普通話的人會被視為外人。而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人愈來愈接受普通話為國家的共同語言。調查中顯示人們對普通話表示自豪，由1996年的18.6%升至2006年的34%。

以上這些民族化的文化標記，大部分的香港人頗樂於接受，不過，其他方面的標記則不大容易獲得認同。軍事標記，如解放軍和公安，在中國，兩者都象徵了國家的主權，在回歸的前後經常出現在民族團圓融

合的論述中。可是，這是香港人最感到不舒服的兩個標記。1996年的調查，有30.3%的受訪者稱他們對解放軍感到抗拒，對公安感到抗拒的也有38.9%。現在，這情況有顯著的改變，香港人對解放軍的負面印象已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和藹可親的友善形象，這是因為特區解放軍小心經營親民的公關活動。1996年被訪者對解放軍感抗拒的有30.3%，及後於2006年，有此感覺的只有7.5%。相反，對解放軍感自豪的，由1996年的10%上升至2006年的28.8%；親切的感覺就由7%升到20.5%。但是，或許由於許多媒體不時報導港人遭公安拘留的新聞，所以，香港人對公安仍然存在抗拒的感覺，在1996年和2006年的情況都相若。在2006年，24.5%的受訪者對公安有抗拒感，只有6.7%是感到自豪，5.9%是感到親切。

其他民族標記，如國旗、國歌和人民大會堂，都屬與中國政府有關的類別。在2002年至2006年間，人們對國旗和國歌的自豪感覺和親切程度有明顯的上升。在1996年至2002年期間，對這兩個標記的感覺是穩定的。後來，在2002年至2006年，對國旗感到自豪和親切的，分別由31.1%升至47.6%，以及由32.2%升至42.6%。至於國歌，在這段時期，感到自豪的由38.1%升至48.2%。雖然如此，依然有大部分的受訪者指他們對國旗或國歌均沒有一種自豪或親切的感覺。至於人民大會堂，是全國人大會議舉行的場所，然而，像國旗和國歌一樣，縱使在香港的媒體有廣泛報道，卻仍然未能使香港人對此有強烈親切感。

除中華民族的標記外，我們也探討了香港人對香港文化標記的感覺。在1996年的調查，香港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徽沒有抗拒、親切或自豪的感覺。在2006年的調查結果則有顯著的不同，雖然感覺仍不很強烈，對區徽感自豪的只有29.2%，親切的有33%。不過，香港人對文化標記則抱有濃厚的感情，如享負盛名的維多利亞港晚上的景色，有60%至70%的受訪者為此感到自豪，僅次於前文提及的萬里長城（70%至80%）。

整個調查給我們繪畫出一幅民族化的圖畫，既複雜，又清晰。香港人大致上對本土的標記有濃烈的感覺；對於中國的文化、軍事和民族的標記則懷有好壞參半的情感。他們非常認同那些文化和歷史的標記，對政治和軍事的標記則依然有所保留，或不大願意接受。這表示香港民族

化的獨特過程，因為這是多角度變化的，對文化、軍事、本土和民族的標記有互相矛盾的情感反應。這種複雜性衍生出一多重分析的框架，以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轉變作出敏感的回應。

本土身份與民族身份的角力

由單一到多元的文化定位

此部分會重新分析上文調查研究的概念框架，但非要反駁其中的結果，調查的設計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分析香港身份時加入不同標記來研究港人的反應，可探測身份認同的多元性。然而，若把調查顯示出來的樣式跟廣泛的本土身份研究論述相互分析比較，或會產生更有意義的討論。十年的縱向研究探索，可解釋社會和文化的趨勢，但我們也要承認這類研究的方法和概念框架，其實是在特定時代的理論構建。因此，反覆思量研究設計，以及重新思索概念框架均能讓我們更了解其中的發現。

自2002年的調查開始，我們明白以二元框架來識別香港人和內地人是有不足之處的。在2006年的調查中，我們摒除認知上的區別，反多注重香港人對本地及民族標誌的情感，這些標誌可更彈性地教我們認識多元變化的身份結構。我們也包括了一系列有關香港人是否與中國內地有緊密聯繫的問題，假定了當有愈多的跨境接觸、溝通和交流，便會導致中國和香港的文化邊界愈見模糊，因而有可能削弱二元框架上建立的身份的解釋力。前文提到的二元框架，意指有強烈的本土身份，就暗示了民族身份會較微弱；可是，2006年的調查結果指出一個重大的轉變，便是在1980和1990年代，本土身份以及民族身份的關係，本是兩極對立的，現卻變成有正面的關係。在2006年的調查中，我們加入了不同的問題，以10分為滿分，去比較香港人對香港、中國和共產黨的喜愛程度。

結果表示，香港人愛香港(7.52分)高於愛中國(6.49分)，這跟前文提及的文化身份的數據相若，香港身份是基於強調其相對於中國的定位。不過，明顯地，中華民族賦予香港人正面的情感；反之，共產黨則不然(愛黨有2.91分)；並且，「中國」予受訪者的感覺是有多層意義的，「國」和「黨」則有清晰的分野。

調查也表現出一個非對抗的定位，「愛香港」和「愛中國」兩者是息息相關的 ($r=.47, p<.01$)，「愛香港」和「愛黨」的關係亦然 ($r=.22, p<.01$)。在政權過渡後期，因有著不同的因素，如各種的既得利益、血緣關係、商貿關係，本土和國族的融合已開始出現，縮減了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文化差距。

然而，在過渡後期，「中國他者」作為定位的重要性已逐漸褪色，但這並不代表香港身份的形成可擺脫任何定位，反而是指這不再基於單一定位。多重、不同的定位是明顯的，而且存在已久，只是通常被主流的國族—本土二分法的論述遮蔽而已。Starosta & Chen (2003) 描述身份建構的特定過程為身份的中間路線，基本上是代表身份的雙重力量：一方面是對主流壓力的反應，由抗拒到同化；另一方面是內心渴望去復修和重申一些傳統承傳的核心價值和文化。據此，當權者會積極取代一切可能形成本土身份的文化力量，當然這包括英國和其他外國的利益。一些本地人自覺有責於中國政權，他們有選擇欣然接受新制度，也有是被動地不得不接受的；但是，總沒有可以忽視這個中國政權的出現。

外在和內在因素同樣影響著身份的形成。香港回歸後，其身份變得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文化定位變得更短暫、臨時、具開放性 (Starosta & Chen, 2003)。我們可以見到香港特區政府和傳媒積極建立新的香港身份，例如香港跟紐約比較，同樣是領先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個亞洲國際都會，² 也是個國際的商貿中心。³ 假如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聯繫是理所當然的，但香港也擁有地區性和國際性的特質，故香港人開始更多提及紐約、倫敦、新加坡和其他城市，作為本土身份的參考。文化參照遂更多元化、複雜和具策略性。

國族—本土二分化的問題

本土人口結構在轉化，動搖了香港身份中本土—國族的概念。這些年來，不斷有大陸移民入境，影響了香港人口中本地出生人口的比例。根據2006年的調查，35.8%的香港人曾在中國居住一年或以上。迅速的人口流動使邊境兩地的接觸愈見頻繁。事實上，若我們描述香港身份時撇除大陸的聯繫，誠是極大缺失。

在2006年的調查中，77.3%的受訪者指他們有在中國的親戚、朋友、同事，其中的59.4%稱他們每天都有跟他們有聯絡。對香港人而言，跨境經驗豐富了他們對中國大陸的了解，藉著真實的經驗來補充從媒體上得到的印象。那些與中國有較強聯繫的被訪者，會較少以媒體作為建立中國形象的單一來源，本土和國族身份會多倚賴跨境經驗作參照。調查結果又顯示，那些在大陸居住與經常來往大陸的人，跟從沒有到過或比較少往大陸的人比較，他們幾乎對所有的中國標記，包括國旗、國歌、普通話、解放軍和公安都有較強烈的親切與自豪感(數據誤差為 .01水平)，亦少了一點抗拒感。這些結果表示因為有愈多大陸人移居香港，香港人口結構不同了，便有愈多人感到有混合的中國及香港身份；也解釋了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聯繫愈益頻繁，就會改變人們本土和國族身份的觀感。調查顯示，那些與大陸的親戚、朋友或同事有聯繫的人比沒有聯繫的人對那些中國標誌較喜愛，並有較強烈的自豪感(數據誤差為 .01水平)。這親切和自豪的感覺反映出不同程度的身份，跨境聯繫、以及隨之而來的直接社交接觸都成為身份形成的重要因素。而這些直接的經驗會漸漸補充媒體中大陸的形象，從而衍生一個重要問題：香港媒體不斷轉變的角色如何構成本土和國族身份？

媒體中的國族想像(1980至1990年代)

於1980和1990年代，基於不同的意識形態，香港人對中國的觀感乃透過流行文化、大眾媒介表現出來。媒體符號(如 Ma & Fung, 1999)和重大媒體事件(如Lee, Chan, Pan & So, 2002)已經變成觀眾湊合對中國內地、香港特區和他們自己的身份的基本認知。香港人經常往返中國，可是，跟近年愈頻繁和常規性的跨境聯繫比較，1980和1990年代的跨境聯繫確實沒有那麼廣泛。從前，傳媒是呈現負面的國族想像的主要角色，大陸和香港截然不同的生活習慣也加強了兩地的分野，其實，這種因傳媒而普及的二元框架，限制了香港人到大陸時的觀感(Ma, 1999)。

及後，政權轉變，部分媒體承擔起積極、正面推銷中國的責任。因此，於1990年代中期，由當權者製造出來的媒介事件，表現於香港媒體之中，淡化了「中國問題」，在香港人眼前呈現一個新的中國形象。當大

眾接觸這些媒體中的中國符號，距離很遠的中國文化變得近在咫尺，神秘的軍隊的透明度提高了，冰冷的民族符號，顯得和藹可親。在1996年至2006年間，媒體中出現更多有關民族的影像，這或是人們普遍對中國標誌愈感親切和自豪的其中一個原因。1990年代中期的媒體，致力消除本土和國族的對立，結果，愈來愈多香港人稱自己的身份是香港人和中國人的混合。

強化跨境聯繫 (2000年代)

現在，香港人和大陸人的接觸愈趨頻繁、複合，這令他們能更直接、即時和準確地繪畫出一幅大陸的圖畫。媒體中的國族想像和現實的社交經驗變得更複雜(馬傑偉，2006)。同時，香港人對那直接的經驗又表現得不知所措，因不同媒體對中國的描述存在差異、矛盾；而且，媒體上的中國形象和他們真實見到的又大不相同。故此，問題就在於當香港人本身已對中國有豐富的實際經驗時，媒體的描繪究竟有多重要。

首先，自1990年代後期，大眾媒介不再單單對大陸人塑造一個簡單和負面的形象。對國家矛盾的想像愈來愈普遍，反映出新的國族化的政治觀念和對大陸人和共產黨政權根深柢固的負面情緒在互相角力(Mathews, Ma & Lui, 2007)。香港特區政府推行不同的運動，媒體上不停出現不同的民族標誌；但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又積極為香港建立一個亞洲區國際城市的品牌。這些媒體中身份建構的來源，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國族性的，使香港人同時處於中華民族和國際共同體之中。

此外，頻繁的跨境經驗影響那個曾在媒體盛行的大陸—香港二元結構。如前所述，那些與大陸有較多聯繫的香港人，會有較強烈的本土、國族雙重身份。再者，香港大眾不同的跨境經驗其實是更複雜的。我們仔細看看調查結果，發現在跟大陸有較多聯繫的香港人中，擁有較高收入的(約為港幣\$60,000)，通常較難接受公安、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數據誤差為.05水平)，這三個指標都是調查中香港人最難以接納的。雖然這高收入的一群，跨境接觸較高，賺錢能力較強，又更認識中國，然而他們似乎不甚認同那個制度，他們既對此抱樂觀的態度，但又有一種不安的

感覺。感樂觀的原因是中國市場的不斷發展；感到不安或許是因為他們知道大陸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在商場中普遍的貪污情況。

收入高、跨境經驗豐富的一群所面對的窘境，也代表了香港一個普遍現象。香港人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國家—市場的複雜狀況，其中政治和經濟利益是不能分開的。欲與中國分享經濟成果，香港人，尤其是商人，便得迎合國家的政治利益，這些利益有時需要對本土利益作出妥協，如降低專業的要求和政治自主權。從前媒體中那個讓香港人建立身份的簡單二元結構已經不再適用。主權回歸後的十年裡，香港人需要從複雜的媒介標誌和頻繁的跨境經驗中尋找自身的本土和國族身份，他們對國運日隆抱有期望，卻又對中國社會各種問題心存懷疑，所以，他們就要在這認知上的不協調中積極尋求平衡。

簡言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媒體塑造出一個負面的大陸形象。而自1990年代後期及2000年代始，媒體提供了更複雜、更多元化的中華民族形象，這些形象又經常受到頻繁的跨境經驗衝擊而不斷重整。然而，因為在強化民族身份時存有種種的政治因素，傳播媒介只有給予香港人更多更強的民族身份的廣泛論述。

結語

本文嘗試通過分析調查結果，勾勒出香港人的本土和國族身份。過去十年，香港人都是在多重，甚或是互相矛盾的身份裡掙扎。本文分辨出一系列不斷變形的多重身份。香港人有中國人的歷史身份(Wang, 1991)，這是因為人們對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大傳統」(如萬里長城和傳統中國文化精神)有自豪感。香港人也有強烈的文化身份，是一個靈活的、包容的身份，可容納中國的、非中國的特質。1997年後香港人有一個新的國族身份：這是一個與當權政府相關的法律、軍事和政治相關的身份，由港人對流行標記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肯定可見一斑。從調查可知，愈多香港人稱自己有一個混合的本土國族身份，他們嘗試把自己的本土文化身份連繫到國族身份上，在他們眼中，這是有多層意義的，對文化、經濟、歷史方面有同感，在軍事、政治方面則不大相容。

除了指出調查結果及加以分析，我們也重新整理研究香港身份的一

些假設，即是過份依賴以中國內地為負面定位的本土身份構造。在1997年前後數年間，如調查顯示，在香港人眼裡，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的關連愈來愈相近，兩者在經濟領域中的差距也拉近了，在政治範圍的差異則仍然鮮明。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跟大陸人有更多接觸，從前在媒體中盛行的大陸—香港二元化的現象不再適用於繁複的互動當中。另外，我們不難發現，之前香港人把自己區別於「其他」大陸人的一些核心價值，如勤奮、實際、能適應新環境和自由等，其實與世界各地的城市人的全球資本主義價值沒有太大差異 (Fung, forthcoming)。現在，因中國已不復是本土身份的負面參考對象，香港身份的形成遂變得更開放於國族和全球的價值。要重新整理香港身份，便得跟中華民族以及亞洲，甚或全球的城市建立新的聯繫，互相對比參照。

因此，我們認為，香港現融入了中國內地，愈來愈多日常生活的接觸和跨境經驗，已經淡化了單單視中國為最大「他者」而建構自己的身份。儘管兩地有顯著的政治分歧，但國族和本土身份已開始結合。傳播媒介的角色也在改變，從前致力建造國族—本土的二元結構，自1990年代後期始就停止了。現在，傳播媒介為民族化的過程提供一個新平台，而由於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強大推動力，媒體中的國族想像變得愈來愈明顯，從而推廣了國族身份。並且，香港人透過具體的社交網絡，愈能體驗國內具體的社會實況。媒體的形象和社會經驗的互動是前所未見的，本土身份的構成，在於直接經驗、媒體符號，以及社會、經濟、政治現實的匯聚。

最後，我們推測，在不遠的將來，本土身份會受經濟國族主義所影響。中國內地是香港經濟的強大後盾，與中國有緊密商貿接觸的人，自然會傾向於投向祖國的懷抱。這情況也許如 Ferguson (1995) 所描述般：全球市場的討論與文化普遍主義互相影響，我們最後會發現，在香港，那本土政治現實便是經濟國族主義。事實上，香港人，尤其是擁有較高經濟地位的人，他們面對的困境是要比較媒體中的國族想像和他們自己的親身觀察。漸漸地，香港人會發現，他們從中國得到經濟利益，但亦要忍受中國那半發達國家市場的複雜性，以及一些跟他們觀點相違背的價值。亦即是說，經濟上背靠祖國，但本土利益和價值則要作出過渡性的妥協。未來香港身份的改變，會因為這個窘境而觸發本土/國族價值的重新建構。

參考文獻

- 冼玉儀(編)(1995)。《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吳俊雄、張志偉(編)(2002)。《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馬傑偉(2006)。〈市井國族主義：重劃大陸與香港的文化版圖〉。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香港·文化·研究》(頁257-283)。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 Calhoun, C. (Ed.).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Ferguson, M. (1995). Media, markets, and ident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global-local dialectic.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4), 439-459.
- Fung, A. (forthcoming). Discourse and cultural identity: Towards a glob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In D. Wu (Ed.), *Discourses of cultural China in the globalizing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 & du Gay, P. (Eds.).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 Lau, S. K. (2000). Hongkongese or Chinese: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In S. K. Lau (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pp. 255-283).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C., Chan, J., Pan, Z., & So, C.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a, E.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of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Ma, E., & Fung, A. (1999). Re-sinicization, nationalism and the Hong Kong identity. In C. So & J. M. Chan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pp. 497-528).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athews, G., Ma, E., & Lui, T. L. (2007).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Scheff, T. (1994). Emotions and identity: A theory of ethnic nationalism. In C.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277-303). Oxfor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Starosta, W. J., & Chen, G. (2003). On theorizing difference: Culture as centrism.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26, 277-303.
- Wang, G. W. (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Wong, T. W. P. (1996).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 50.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註釋

1. 本文翻譯與改寫自 Ma, E., & Fung, A. (2007). Negotiating lo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 Hong Kong identity survey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72–185。
2. 參看<http://www.brandhk.gov.hk/brandhk/eindex.htm>
3. 參看<http://www.lcsd.gov.hk/me/hkstf/en/index.php>